

唐崖土司城址：鄂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 黄柏权

在鄂西南大山中隐藏着一处耀眼的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唐崖河畔。考古发掘证实，土司城天然壕沟内面积74万平方米，城内主体面积35万平方米，是鄂西南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土司城遗址。城内功能齐全完备，有引排水系统、水井、码头、碾厂、衙署、牌坊、庙宇等，俗称“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被考古学家张忠培喻为“小故宫”。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土司文化标识，唐崖土司城址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巨变，仍然在讲述着历史上多民族交流互动、中原与边疆友好往来的佳话。

承载着鄂西南各民族交往的历史记忆

唐崖土司从元至正六年（1346年）建立长官司到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历时389年。在数百年的历程中，唐崖土司城见证并承载着鄂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宝贵历史记忆。

施州卫作为明朝中央管控鄂西南地区土司的重要军政机构，其官员与唐崖土司交往密切、互动频繁。明朝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接受教育方能世袭，施州卫学是鄂西南土司子弟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唐崖土司也进入施州卫学读书习礼，在学习中与施州卫官员形成了友好关系。如施州卫武官童璋与唐崖土司覃彦实建立了良好关系，童璋不仅教导土司改变传统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传播汉区农耕技术，还积极倡导变革土司习俗。唐崖土司通过与施州卫官员的互动交流，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唐崖土司还积极主动与外地族群交往交流，并将外来文化融于本土之中。如土司覃鼎夫人田氏率婢女随从前往四川峨眉山参拜，学习佛法，归来后即仿照峨眉山寺院建立了大寺堂，这是唐崖土司历史上主动学习外

来文化的典型案例。田氏还将带去的几百名婢女沿途婚配，推动了当地居民与外地人群的友好往来。

对于外来客民，唐崖土司也秉持包容接纳的态度。明万历年间，原籍荆州府江陵县文人张云松来到咸丰县隐居。覃鼎夫妇得知后即延请张云松到唐崖土司城协助筹办书院，教习诸生，并在当地传授汉文化，该书院后成为当时汉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张覃两家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并进行联姻，成为当地世代相传的一段佳话。

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土司城选址采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象”和“天人合一”理念。土司城依山傍水，在选址时大胆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四象”观念。规划者将土司城周边的山形与“四象”结合，将土司城的靠山命名为象征北方的玄武山，将土司城面向的山命名为象征南方的朱雀山，将土司城左右两侧的山分别命名为象征东方的青龙山和象征西方的白虎山。虽然土司城坐西朝东，但通过设计者的想象和规划，在精神层面上，它实际上就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城邑。“四象”观念的引入使土司城超越了地域的局限，与中原皇家城邑的意象更为接近。同时，规划者还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恰如其分地融入土司城的规划和营造中。整个土司城的规划和营造顺应山岳、沟壑的走势，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以山脉、河流、溪沟为天然屏障，注重自然与建筑在空间上的协调，体现了人文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表现出对自然的依恋和顺应。

土司城的布局和功能分区借鉴了中原三重布局和中轴线观念。土司城的布局与功能划分深受中原建筑观念的影响，将中原三重布局和中轴线观念全盘吸纳。土司城在布局上三重结构布局明显，土司城周围的天然壕沟

为第一道城墙，核心区人工垒成的城墙为第二道城墙，衙署区的围墙为第三道城墙，这种三重结构体系，明显受到中原都城建制“外城—皇城—宫城”格局的影响。从整体结构形态看，土司城具有明显的规整方正布局理念，中轴线从局部发展到整体，形成沿中轴线两侧对称的城市形态。这也是明代中后期西南地区土司学习、吸收汉文化的结果。

土司城的建筑和雕刻吸收了汉文化的诸多元素。从建筑风格上看，石牌坊、石墓葬等本身就是中原的建筑形式，是中原建筑在唐崖土司城的运用。从装饰图案看，石牌坊有“土王出巡”“麒麟奔天”“哪吒闹海”“舜耕南山”“渔樵耕读”“云龙吞雾”等题材，土司王坟有圆形龙纹、圆形花草纹、狮子戏球、麒麟等图案，这些元素充分借用了汉文化的元素。从雕刻技法看，牌坊、石人石马、土司王坟、“金凤献瑞”石鸟等雕刻作品，在浮雕、透雕、镂空雕等技法上都有娴熟的运用，明显受到中原雕刻技艺的影响。当然，土司城的布局 and 建筑也融入了诸多本土文化的因子，如干栏建筑的广泛运用，石水缸的使用，装饰符号中“土王出巡”和众多本土花草图案等，这些彰显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深度交融。

多民族文化融合特征何以形成

唐崖土司城址之所以呈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与其长期保持和中央王朝的联系有关。唐崖土司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进贡与回赐。唐崖土司长期向中央王朝进贡马和其他物品，仅《明实录》



从考古看文明

（上接1版）

深刻理解把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取向和科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要适应时代要求创新思路，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向统筹协调转变，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两个积极看待”是科学谋划老龄事业发展的逻辑起点，是正确认识老龄工作的科学态度；“三个应对”和“四个转变”指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学思路。我们要牢固树立积极老龄观，全面辩证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系统谋划、科学施策，切实提高做好老龄工作的整体性、前瞻性、针对性。

深刻理解把握老龄工作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度，着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和老龄产业，着力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着力健全老龄工作体制机制；要加大力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着力”“四个体系”，指明了老龄工作“抓什么”，明确了重点任务。我们要强化对重大政策规划实施的评估和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发挥好各级老龄委、老龄办职能作用，强化对成员单位的统筹协调，破解老龄政策“部门化”“碎片化”难题，推进涉老政策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深刻理解把握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使民生改善

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养老服务业既是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当前银发经济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维护老年人尊严和权利，而且能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和谐。我们要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双重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变量，也是慢变量，但不是“黑天鹅”事件。我国处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机遇期。人口老龄化会倒逼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素质提升、就业结构和方式转型，促进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我们既要高度重视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又要看到老龄化蕴藏着新的发展机遇，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培育发展新动能。

加快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落地落实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把握人口发展趋势和老龄化规律作出的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重大部署。我们要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趋势，增强科学预判、做好前瞻部署、细化落实举措，加快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各项部署落地落实。

坚持和加强党对老龄工作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老龄工作的政治性、全局性、战略性、多元性、复杂性，决定了只有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的方针，才能把准方向、凝聚力量、协调行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老龄工作中得到全面有效贯彻，形成多元主体责任共担、老龄化风险梯次应对、老龄事业人人参与的新局面，始终保证老龄工作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和鲜明价值导向。

加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要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增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信心。推动将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训内容，纳入干部网络教育和培训课程，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和创新对老年人正面形象和积极作用的宣传，进一步引导公众积极看待个体老年期和社会老龄化。更加科学全面地定义“老年”，消除对“衰老”的害怕和恐惧，把老年人看作人的生命中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阶段。

用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窗口期”。从现在到2035年之前的10年左右时间，是本世纪剩余时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的时期，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一方面，中国经济仍有潜力保持合理增长速度。这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资源，支撑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发展国家战略。另一方面，老年人低龄化特征显著。我国老年人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相对较多，约占全体老年人的56%，预计到2030年仍可保持在50%以上。这些低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社会保障待遇更好，社会参与意识也更强烈。这是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和优势。机会窗口既非永恒，也不会长期延续，必须清楚认识、牢牢把握和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窗口期，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建立健全覆盖全人

记载的唐崖土司向中央王朝进贡就达9次。进贡和回赐，密切了唐崖土司治理区域与中原的联系和交流。二是参与中央王朝的征调。唐崖土司所属部族服从朝廷的调遣，参与平定各种叛乱，有记载的征调就达14次。频繁的征调，既强化了唐崖土司所属部族对中央权威和“大一统”的认同，也为其提供了与外界交往的机会。

唐崖土司城址体现的多元文化与其“开化”传统亦有关系。唐崖土司城址处于楚蜀交会地带，自古就是江汉平原进入大西南的通道和东西人口迁徙流动的走廊，人群流动促进了文化交流。同时，咸丰县虽然地处山区，但开化很早，民风淳朴。民国《咸丰县志》称：“县境自周秦以来，日渐开化，且民俗纯良，较之他属，尚无犷悍喜乱之习”。由于开化甚早，容易接纳外来风气。“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孙蕃衍，为邑望族者也。”外地人口大规模流入，不仅改变了人口结构，也带来了外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思想观念，促进了本土居民与外来人群的交流互鉴。唐崖土司还主动学习和吸纳来自各地的文化，例如邀请荆州文人张云松到土司城内办书院、教授城中子弟。“开化”包容的气度，主动引进、学习外来文化的心态，为多民族文化交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总之，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唐崖土司城址蕴含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元素，是古代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并作为物化的成果见证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政权秉承的“修教齐政、因俗而治”理念在鄂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是美国新儒学派的主要创建者。狄百瑞的新儒学研究对美国乃至国际汉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专著及汇编文本亦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为中西文明对话搭建起新的桥梁。他所编撰的东方文明系列读本被多次再版，屡获美国教学奖项，为美国多所高校通用教材，有效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用新儒学研究批判西方“冲击—回应”模式。攻读博士期间，狄百瑞论文研究对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自开启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译介，狄百瑞便被深厚的新儒学所折服，并将其确立为一生所执着的学术研究。狄百瑞研究的新儒学是一个海外汉学中的概念，与国内的现代新儒学、当代新儒学等皆不同。它通行于西方汉学界，研究内容主要为唐末至清初儒者在重振与坚守儒家思想上所作出的努力。

1953年，狄百瑞发表文章《重评新儒学》，并于1957年开始承担“新儒学研究”项目，出版系列相关书籍，推进美国儒学研究从政治运作角度，转向深入儒家人格和文化思想内部，并促使美国汉学研究重心逐渐从先秦转向新儒学。随着新儒学的影响力逐渐提升，大量新生力量的加入，新儒学学术研究对象内容逐渐扩展至“道统”“理学”“乡约”“社学”“书院”等各个方面。时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儒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得以建立。

狄百瑞汉学研究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正值美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盛行时期，其中尤以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最为典型，认为中国的过去静止不变，无法自我更新，需依靠外力才能发展进步。狄百瑞并不赞同此种看法，他以颇具批判思维的新儒学代表人物黄宗羲为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中华文明尤其是新儒学，不仅具有批判精神，更有与异质文明沟通对话互补互融、推进自我革新发展的能力。狄百瑞亦不赞成韦伯、汤因比等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历史材料的方法，认为人们应该立足世界文化多元立场，否定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华文明的方式，指出其“具有的自我批判、创造和发展之能力”。在研读《明夷待访录》的过程中，狄百瑞发现新儒学对传统君、臣身份定位等问题的批判，很好地驳斥了西方认为中华文明静止、停滞等观点。新儒学对“法”的认识，反击了西方认为中华文明封建、落后等观点；对书院“清议”等功能的认识，证明了中华文明自身已具有进步思想，而非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刺激才能转化发展等观点。

狄百瑞认为中国思想文化具有革新力和创造力，而新儒学则是最具这种革新力和创造力的代表性学说。他坚信中华文明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演进，根本无需其他文明的冲击和影响，印证这种观点的还有新儒学思想中“理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心学”的个体思维方式，以及《明夷待访录》等新儒学代表作品中呈现出的东方人权等需求。

把新儒学视作中西文明对话的桥梁。狄百瑞指出，在世界大融合的当今社会，中西文明对话尤为重要，新儒学因其自身所具有批判、革新与发展之能力，并同时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近代性特质，是成熟独立的思想体系，具备与西方文明对话之条件。

狄百瑞开展的新儒学研究，不仅认可并让世界看到丰富独立的东方文明，更是强调以他者视角检视自我文明，通过文明对话互补互融，能够促进文明自我更新。例如，狄百瑞提出的以新儒家的人格主义观照西方的个人主义。

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导致威权主义的弊端日现，狄百瑞看到了西方文化中“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并认为纯粹的个人主义是不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个体都必须生存于一个有秩序的群体之中，“没有真正单独的个人可以存在”，“只要是一个人，他必须生存于一个群体之中”。而在欧洲文化内部似乎是无法解决个体与群体的冲突这个问题了。

狄百瑞在新儒学研究过程中发现，与西方个人主义不同，新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同时也强调个人之于“道”“天命”的强烈责任意识，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价值实现的良性互动关系等，这种能够缓和西方个人主义之内部矛盾，介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个人主体认知，被狄百瑞称为“人格主义”。新儒学“人格主义”对自我的规定是整体性、综合性

以新儒学研究推动中西文明对话

□ 邓琳

的，具体而言即身与心的统一、天与人的统一、个体与社群的统一、阶段性与过程性的统一。狄百瑞有关新儒学人格主义的解读，拓宽了西方有关个体认知的维度，对西方反思个人主义的弊端有深刻启示。

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的传播。狄百瑞将其以新儒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悉数投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教材编写和教育实践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1949年，狄百瑞主持“哥伦比亚大学新东方研究”项目课程教材翻译编写工作，开启中华文明教育实践历程。该项目的具体任务是翻译并编写开设“东方文明”课程所需要的教材，代表作品有《走进东方经典：大众教育之亚洲文学与思想》《东亚传统典籍汇编》《新儒学词典：北溪字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典籍汇编》套书中，狄百瑞具体负责的章节内容，几乎涵盖新儒学时期所有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包括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欧阳修的《正统论》、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程颢的《论十事札子》、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等，弥补了国际汉学界新儒学阶段学术资源的不足，系统展现出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扩大了新儒学在美国乃至国际汉学界的影响。

在其从事教学工作的半个多世纪里，狄百瑞极大地推动了哥伦比亚大学乃至美国“东方人文”“东方文明”课程教学的发展，使美国乃至世界的亚洲文明教育发展受益。1987年《纽约时报》报道称，“狄百瑞的《中国传统典籍汇编》在过去25年里成为中国大学非小说类畅销书第四名”，同年狄百瑞获得马克·范伦杰出教学奖。

2017年7月14日，98岁高龄的狄百瑞在纽约去世。狄百瑞的新儒学研究，立足世界文化多元视角，认可并遵从中华文明特色，对新儒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解读，并努力找寻人类在根本价值追求上的同质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以期在中西文明对话中增进彼此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以新儒学研究为依托，狄百瑞一生致力于推动异质文明对话交流，完美实践了“士不抱以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远大抱负。



海外汉学家